



列宁三次遇险记

列宁三次遇险记

[苏]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著

杨 春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ТРИ ПОКУШЕНИЯ НА В. И. ЛЕНИНА

ВЛ. БОНЧ-БРУЕВИЧ

据莫斯科联邦出版社一九三〇年版译出

列宁三次遇险记

[苏]弗·邦契—布鲁也维奇 著

杨 春 华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375 印张 103,000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41,200册

统一书号：3203·033 定价：0.47元

译 者 的 话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三次遇险，阶级敌人险些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数十年来，这一重大案件的内幕，人们知之甚少。本书作者邦契—布鲁也维奇长期在列宁身边工作，负责保卫列宁的安全。他调查研究了这些案件的有关材料，并进行核实之后，写出了《列宁三次遇险记》一书。

邦契—布鲁也维奇为职业革命家。十月革命后，他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还负责全国部分治安工作。他写了不少反映列宁革命事迹的作品。本书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伟大领袖列宁勇敢捍卫苏维埃政权的顽强意志和革命精神，以及列宁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坚决反对特殊化的高贵品质。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

于北京

目 录

列宁第一次遇险	1
列宁第二次遇险	54
列宁第三次遇险	92
一份有历史价值的材料	121
《谋害》——一个行刺者的自述	125

列宁第一次遇险

(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

(据此案侦查员的个人回忆和行刺者的
两份手稿而写)

一

我在这里想要叙述的是一次危及列宁生命的悲惨事件，它涉及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情况。对此，人们还知道得很少，许多情节还需要加以认真说明。

在这个不幸的日子里，我没有在彼得格勒，而是在靠近芬兰的一个地方休息。我所以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的身体过于疲劳，并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强烈要求。在这期间，我把斯莫尔尼宫“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工作——观察反革命势力动向的任务，委托给我的副手菲什曼同志，他当时为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分子，现在他在我们的一个重要岗位上工作。我在那里休息得并不算好，种种事件把我提前召回了彼得格勒。一月一日清早，我们启程返回彼得格勒。当我们来到穆斯塔米亚卡车站时才知道，铁路根本不通，从彼得格勒发出的车辆不知什么原因不予放行；更令人费解的是，从芬兰到彼得格勒的火车竟无一辆通过。

在车站上，旅客们的情绪可以说是坏到了极点，但是我却没有听说当地的资本家和地主乘机在这里乱发牢骚的现象。却有人说，芬兰维堡一带发生了一场暴动，起义者占领了车站，拦截了车辆。于是谣言四起，交通中断，火车也不开了，我们便准备骑马而行。傍晚四点前后，从芬兰的白岛车站开来了一列火车，在穆斯塔米亚卡停了一分钟，又继续向前驶去。机车上，车厢里，制动台上，到处挤满了全副武装的俄国兵，他们在准备返回部队。

我走上站台，看到这批身着军服的人，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完全破坏了军纪，拿着枪四处射击，把国家的宝贵财产任意挥霍。他们的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人们四处逃窜。我站在站台上对着士兵们喊：

“你们为啥要乱开枪？这只能白白浪费子弹……”

火车已经离去。我的话自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记得有个士兵甚至还用枪来威胁我。

芬兰的几个间谍却狠狠地抓住了这个小小的事件，他们向本国政府报告，说我“指挥”着士兵从俄国发动了进攻。芬兰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也对我进行了百般的攻击，其嚣张之势久久未能平息。

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终于从站长那里获悉：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一列客车马上就要来到，车上坐的全是些水兵，他们刚度完假，准备返回舰队。然而，芬兰政府决定把列车截在穆斯塔米亚卡，不准继续前进，并让车上的全部俄国旅客乘原车返回彼得格勒。

从彼得格勒开来的列车已经到了，水兵们挤出了车厢。站长向我介绍了情况，我向水兵们告诉了自己的姓名，请求他们把我和我的家属带上列车。他们对我的要求欣然同意，还帮我扛上了行李。几分钟后，我们便上了车，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列车晚了点。当天^①傍晚八点多钟，我们才离开这里，向彼得格勒驶去。夜里十一点左右，列车才抵达彼得格勒。这段路程虽然十分短暂，而我们却花去了一整天时间。深夜十二点左右，我才回到家。这时，斯莫尔尼宫七十五号办公室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有急事，要我立刻去一趟。

我一到那儿就立即得知：原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今天参加了一个团的群众大会，他在乘车回来的路上被人用枪打伤了。那辆汽车几处中弹，与他同行的一位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弗·普拉廷的一个手指头也受了伤。当时，普拉廷机械地按下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结果一颗子弹便从保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头部的普拉廷的一个手指头上擦了过去。好险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差点就丧了生，这种危险简直达到间不容发的程度。

我真想马上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但是他已经入睡。我只见到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②，她说我不该到这里来。然而这里许多问题须要处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生

^① 即一月一日。——译者注

^② (1878—1937) 列宁的妹妹，苏联党和国家的著名活动家。
——译者注

命又是这样的危险。

我听了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话，心里非常难过，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有指示，显然我还是不离开为好。

我便立即开始调查，要设法弄清情况，哪怕是初步的线索也好。这天夜里，我们得到某种小小的暗示：在彼得格勒，有人组织了一个公开的军事集团，他们一直在寻找刺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机会。后来我们连续查了好几天，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二

第二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见到我非常高兴。我告诉他，就他遇刺的事已经开始调查，他听了以后却投过锐利的目光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再没有别的事情干了吗？完全不当这样搞……在革命时期，有一些人感到不满，并开枪射击，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您说这里有一个组织，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然会存在这种组织。是军事组织吗？是公开组织吗？这完全可能嘛。”他竭力把话题引到了别的事情上。

我怎么也无法同他谈论这个问题，于是只好直接了当地说，这次谋杀事件针对的不是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样的个人，而是针对人民所选定的政府首脑。因此，我们无权放过这件事情。

我请他给我谈谈这一事件的经过。但是他却说根本没有

工夫。他又说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如果需要了解的话，最好让我去问问与他一起同行的几个人。显然，他在竭力岔开我的话题，不想提供任何证据。

从斯莫尔尼宫七十五号办公室所得到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侦查材料里，却看不出任何脉络，得不出什么有助于查获这一重要案件的新线索。但是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线索就产生于偶然性之中。

三

有一天，我走出彼斯基住所，绕过赫尔松大街五号楼，打算乘车去斯莫尔尼宫，突然一群人挡住了去路，他们是住在附近的男女工人，约有五十人，有许多人早就认识我。他们对几个法令很感兴趣，很想就此听听我的意见。我当然只好停了下来，高兴地向他们介绍他们所关心的一切。突然，我不仅发现，而且感觉到了有个什么人死死地盯着我。他是个士兵，身宽体胖，穿着灰色军服，瞪着两眼看着我。但是，我还是继续回答工人们的问题。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回答了他们的全部问题，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办，于是便同他们握手而别。

“您什么时候参加我们的全体大会呀？全厂的人都等着您呢！……”我所熟悉的附近烟厂的一个女工沙普沙拉对我说，“请您快点来吧！是委员会委派我来找您的……”

我同她约好了时间，告诉了日期，便朝汽车跟前走去。

一堆人跟在我的身后。

“叔叔，用汽车带我们玩玩吧！”几个小孩子朝我跑来说。

“喂！”刚才那个士兵突然朝我喊了一声，“我可以在哪儿见见您，并同您谈一谈吗？……”

“谈什么呢？”我问。

“我本想打死你，”他两眼直钩钩地盯着我说，“本该现在就开枪，但是那些工人却要和您谈谈心，于是我才发生了动摇……”

“太有意思啦！”我对他说，“您是谁呀，老兄？您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您既然想谈，就请上车，我们一起走吧。”

“不，最好让我自个走。”

“莫非您不想去啦！”

“我一定去！”他倔强地说，眼里还冒出了几道凶光。

“要不然，请您到斯莫尔尼宫找我吧，您可以在那儿向我提出您的问题。”

“他们不会放我进去的……”

“一定会让您进去，您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了。你们知道我的姓名吗？”

“我们都知道。”

“那你们都来吧！”

“我们一定去。”

我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让司机开车。我们的车子就向前驶去。

真奇怪？我心里想。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我们家的保姆

曾对我说，最近，有一个士兵常到家里来，并且要求见见我。当她告诉他我不在家而在机关里时，他便严厉地申斥道：

“你尽撒谎，一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我这样对他说：瞧你说的，老兄！谁能藏得了他，他常不在家，老在下面跑，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找他……”保姆向我叙述道。

于是，他便问我们家的保姆，都有谁来找过我。使他感到不解的是，找我的却尽是些工人和农民。

“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着走了出去。从那以后，他就不常来了。

我当时并没有注意保姆这番话的含义，因为找我的人很多，其中有熟人，也有生人。总之，什么人都有……

这里面有什么名堂呢？我在去斯莫尔尼宫的路上想，莫非他纯粹是一个从前线回来的精神病患者，因为这种人本来是很多的。

我开始处理日常工作。我还把自己所遇到的这件令人不解的事情告诉给了七十五号办公室的同志。

大约过了两小时，有人进来告诉我：一个军人非要见我不可，他不等会客时间就来了。他还说有机密事情要对我讲。

我便叫人把他请了进来。

莫非就是那个人吗？我闪出一个念头。

我看到一个人走了过来。

没有错，准是他。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桌前。

“瞧，我来啦。”他说，“给您一支手枪，这是我本来准备打您的那一支。”于是，他把手枪放在了桌面上。

“您是谁？”一个工人同志问。

“我是个军人……刚从前线回来，叫斯皮里多诺夫。”

“同志，请坐，”我对他说，“您说想同我聊聊，那就聊聊吧，我现在有空……”

他坐了下来，面带愧色地说：

“刚才，我还怀有枪杀您的歹念……我错啦……是我错啦……我看到那几位女工对您的态度……她们的表现影响了我。她们同您的交谈是那样亲密无间……于是我想，您可能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敌人。敌人怎能象您这种样子呢？我经过观察得知，您待人亲如兄弟。”他笑着说。

现在，我用一些提示性的问题把他的思路竭力引导到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上。我很想知道，他是同什么人结帮，还是一人单干？……

“等一会儿我全告诉您……您先别着急……”他回答说。看来他好象已经猜透了我的心事，知道我需要的是些什么东西。

工人们和我们委员会的成员由于对这个来访者感到好奇，都纷纷围了过来。

“我的妈呀！”斯皮里多诺夫突然站了起来，感到惊讶地说：“这里尽是些工人，他们是我们的亲兄弟。但是德国先生们却说什么……他们尽骗我们……”

一个身体健壮、被厂里的黑烟熏得黑糊糊的青年工人拍着斯皮里多诺夫的肩膀打趣地说：“老兄，正象你是鞑靼人一样，我们也是德国人……”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斯皮里多诺夫很快就变得无拘无束。他说：他上过前线。他们的部队在前线全散了伙。于是，他便联合了几个同伙（其中有几个军官）决定要杀列宁。他们后来就到了彼得格勒，因为这里有个正式组织。

委员们顿时警觉起来。我简单地记下了他所讲的主要内容。他还提到了一个地址——佩列库普胡同。这个组织的一些人在那里开过会，他本人也常到那里去。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一个妇女家里举行的。但是，其他人的集合地点他却不知道。

四

我开始意识到，他是掌握线索的一个人。

然而，如何做他的工作呢？逮捕他吧，这样将会前功尽弃，让他自由行动吧，他可能对自己的交待表示反悔，并因此惊动所有的人。

我走出房间，立即召来两三个工人出身的委员，向他们交待了任务：现在要对斯皮里多诺夫予以最严密的注意，吃饭时也要与他同行。要让他适应环境，向他讲述革命的道理，带他到外面旅行，并让他参加工人大会。但是，一分钟也不能让他摆脱我们的监督。他们都一一照办了。斯皮里多诺夫

很快就成了我们的人，他常常呆在我的身边。当我们乘车处理许多事情，特别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时，他总是竭力保护着我。

这天晚上，我们来到佩列库普胡同，逮捕了在那所房间里活动的所有的人，还就地设了埋伏，把一批批来到这里的入迅速押往斯莫尔尼宫，当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这样一来，案情便逐渐展开了。

两天以后，我们就搞清了几个接近核心人物的人的身分，逮捕了三个直接参与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军官。但是我们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几个大人物手里的工具。一个军官把全部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我从他那豁出去的情绪来判断，倒觉得他可能是个最重信用、值得同情、误入迷途的人。

我把案情报告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虽然由于遭到这几个青年的谋杀险些要了命，但是他却仍为侦查工作设置了最大的障碍。他象是这几个被告者的辩护人似的，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一会儿对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一会儿要求对看上去完全清楚的证据重新进行调查。他反复问到了谋杀者们的身世。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问到是否给他们送去报纸的时候对我说：“给他们多送些书报，让他们读一读。”

五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十月革命的领

袖，杀害这位最善于了解和反映战斗无产阶级的真正要求、意图和愿望的人？

所有这一切长期以来都不得其解，只有到了现在，在我们偶然之间所得到的证据中却获得了几份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手稿。这些材料是由几乎造成最大灾难的一次凶杀案件的一个主犯亲手写成的。至此，我们终于对首次谋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案件的全部过程得出了一个相当可靠、确切、详尽而又认真的结论。

进行这次谋杀的念头是他们在前线酝酿起来的。当时的背景是，我们宣布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一个长期令人窒息的不战不和的时期已经开始，前线全部崩溃，士兵自行逃散，纷纷急着回家。

前线一带的地主庄园同大后方一样，都燃烧殆尽。

所有的部队都分成敌对的、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有一派坚决主张和平，主张撤离前线，虽然说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军纪的破坏、武器弹药的丢失等等。另一派则坚决主张保持阵容，维护军纪，坚持阵线。如果要撤，则要有秩序的后撤，还得交出弹药武器和保留后勤物资。

前一种人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后一种则反对这种宣传，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是德国人搞的一种把戏。

我们摘录一段手稿作者^①的话来作为引证：

“团里的敌对派被包围了，我们是全副武装，所以对方

① 即Г·列舍托夫。刺杀列宁的主要罪犯之一。——译者注

感到害怕。这种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到了夜里，我们得集中到一个大农舍里睡觉。睡觉时，门口设有岗哨。部队里的女兵被安排在一个大床上休息。‘我们的女兵们是持枪在手，枕戈待旦。’

“我终于对肖马^①说：再呆下去不会有什么盼头和指望了。我们应当立即动员忠于我们的部队复员回家。有一些人为了表示‘同冒牌货一刀两断’已经自动回去了。这种做法不合适。我们应当死得堂堂正正，有所作为！”

手稿的作者接着对肖马说：“我们不是还有一个小队吗？而且队里还有三十个人。我们不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兵吗？而且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按照军人义务所规定的精神办的。我们的团过去在普列夫纳打过一仗，我们的小队不是也象我们的团一样，也在基尔利一巴巴打过一仗吗？团旗在行军中总是走在前头。但是，我们在宣誓仪式上吻过的那面队旗却装在褪了色的皮包里。在部队驻扎下来时，团旗总是放在指挥员的床下。然而，我们小队里的指挥员现在在哪里呢？队旗又在哪里呢？”

作者接着写道：“一旦连队解散，士兵复员，我就成了总司令，你^②就成了参谋长。你来发一道复员令吧！让斯皮里多诺夫以共和国委员的身分在复员令上签字，让奥尔洛夫^③在总军需部队里予以执行。

① 同列舍托夫一起谋杀列宁的罪犯之一。——译者注

② 指肖马。——译者注

③ 与列舍托夫一起的同案犯。——译者注